

文汇原创丛书

中国现代教育的20世纪

艰难的日出

杨东平主撰

文 匯 出 版 社

ISBN 7-80676-418-6



9 787806 764183 >

ISBN7-80676-418-6/G·230

定价：30.00元

肖关鸿主编

編有賴于點滴的積累和改善，具體的實踐和實驗。因而，抱一種尊重和理解的態度

中国现代教育的 20世纪

艰难的日出

当我们深入到20世纪的教育史中，不仅深感历史的深沉和传统的强大，深感这二蜕变之难，也深感认识和理解历史之难。

杨东平主撰

文 匯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艰难的日出:中国现代教育的 20 世纪/杨东平编著.
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 8

ISBN 7-80676-418-6

I. 艰... II. 杨... III. 教育史-研究-中国-20
世纪 IV. G52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0184 号

文汇原创丛书

艰难的日出——中国现代教育的 20 世纪

丛书主编/萧关鸿

主 撰/杨东平

责任编辑/陈飞雪

封面装帧/王建纲

出版发行/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南京理工排版校对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上海浦东联印印刷厂

版 次/200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640 × 940 1/16

字 数/320 千

印 张/23.625

印 数/1—6000

ISBN 7-80676-418-6/G · 230

定 价/30.00 元

关于文汇原创丛书

在科学创造中,个人的灵性最终淹没在对共性和规律的探求中。而艺术的创造,则是一种无可替代的个人的灵性。

如果没有牛顿,一定会有马顿或羊顿取而代之,因为苹果总要从树上掉下来,万有引力总要被发现。

然而如果没有达·芬奇、莎士比亚和曹雪芹,也许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人类还能创造《蒙娜丽莎》、《哈姆雷特》和《红楼梦》这样的不朽之作。

人类文化史是由不可替代的个人灵性构成的。新的天才出现并不会使过去的大师黯然失色。就如李白的光辉不会掩盖曹雪芹的不朽,毕加索的出现不会使达·芬奇失去价值。

真正的作家艺术家的价值在于他们作品的原创性。

他们的个性越是伸展自如,生命力越是自由洋溢,艺术的原创力也越是精彩飞扬。

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给人类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潜藏着巨大的隐患。小小鼠标把一切变得轻而易举,按按电钮使一切变得舒舒服服,趋同与一律化正在扼杀文化的生机,如马尔库塞指出的技术统治社会的“单面人”的危险不再是杞人忧天。人正在逐渐丧失最宝贵的创造力。

当我们在为建设先进文化努力的时候,文化创新自然成为我们最为关注的课题。文化原创力是文化创新的核心所在,如何发掘、发扬和保护文化原创力,如何造成一种能使文化原创力蓬勃发展的文化生态,必须提上我们的议事日程了。

我们把这套丛书命名为原创丛书,只是表明我们的一种态度,一种呼吁,一种要求和一种愿望。

我们希望文化界、出版界和读书界共同来呼唤原创作品,推动原创作品,关注原创作品。

一套丛书只是一块小小的铺路石,我们期待着从我们的背上走来新一代的大作家、大作品。

主编

引 言

世纪回首：中国的教育现代化之梦

杨东平

1

几年前，当我们即将“跨世纪”时，人们从不同的方向总结“告别20世纪”的意义，经常有“蓦然回首”的惊异和感慨。人类社会的变化，在古代是以几百年为一阶段的，近世以来，百年便有沧桑之变。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变化，说“天翻地覆”是毫不过分的，而且翻覆了不止一次。

这是在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运动之中，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世纪，也是中国现代教育建立、生长和发展的世纪，可以说，是一部中国教育“激荡的百年史”。以1904年建立第一个现代学制（癸卯学制）、1905年废除科举为起点，一个世纪以来，现代教育历经数次转型嬗变，几代教育家筚路蓝缕、薪火相传，达到今天的教育规模和教育水平。目前，中国建立起了堪称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3.2亿在校学生和1570万教职工；2000年，中国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全国6岁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7.62年；接受各类高等教育的学生总数达一千万人。上一个世纪之交，中国人孜孜以求的富国强兵、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理想已经基本实现。

自然，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向以工业化、城市化、知识化等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社会的转型，其道路漫漫、艰险诡谲，

如黄仁宇言“犹如走兽之蜕变为飞鸟那么难”。当我们深入到20世纪的教育史中，不仅深感历史的深沉和传统的强大，深感这一“蜕变”之难，也深感认识和理解历史之难。这是一部被过多地结构和解构的历史，充满了否定和误读。在超越了简单的因果论和单纯的政治评价之后，不禁感到对于历史固然需要器识和洞见，但是，也许首先需要破解理性的自负和狂妄——正象面对自然一样。对这么一部起伏跌宕、错综复杂的现代教育史，是什么和为什么同样重要，过程与目的同样重要。在主义的大潮和宏观的理论背后，曾遮蔽了多少不凡的人生、艰辛的探索，而正是每一代人、每一群人在各自不同方向上的追求、他们的努力所包含的独特性、创造性和复杂性，显露了历史的肌理和质感。教育的进步，尤有赖于点滴的积累和改善、具体的实践和实验。因而，抱一种尊重和理解的态度，尽可能地去触摸、体味和感悟历史，从而较多地接近和还原真实的历史，成为一种境界。这是一个基本事实：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大多是前辈曾经做过的；我们今天的所思所想，也大多为前人所思想——而且我们的思想和作为未必比前人更好。正如钱穆所言：“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至少不会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以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1〕

在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中，教育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它的实际状态和地位却十分特殊。作为新文明强有力的杠杆，变革教育成为每一场社会革命的当务之急；作为既往文明的载体，教育又具有内在的保守性，而成为每一场社会变革的众矢之的。以至于在复杂的社会变迁中，教育究竟是社会进步的自变量，是社会变革的推进剂、加速器，还是社会变革的因变量，是社会进步的自然后果，成为扑朔迷离的难题。教育的这种两重性，由于教育作为社会的文化系统，肩负传承和创新的两重使命；而且，由于教育是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组成

〔1〕 钱穆：《国史大纲》（上册），第1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

部分。教育改革于是成为涉及文化变迁、社会变迁、制度变迁的复杂系统工程，是在国家能力和社会力量消长、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意识形态变化、政治权力与教育、学术的关系，教育现代化的动力集团和动力结构、外来文化与民族文化等格局的变动中，诸多因素的互动和合力的结果。因而，在教育学本体的视角之外，加入文化研究和社会研究的视角，多角度、多方位地审视中国现代教育的历程，是我们的另一个追求。

20 世纪中国现代教育风云激荡的历史，形成了一些可以辨识的价值和特点。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态度、对外来教育文化的态度，以及对自身教育改革的态度，或许可以成为理解这一历史的简明线索。

由于现代教育——当时称为新学或新教育——本身是反叛陈旧传统的产物；因而，对封建文化传统的批判改造成为现代教育的出发点和基本任务。在 20 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革新者都对传统教育保持很高的警惕，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但是，一个漫长古老的传统并不可能被轻易打倒、置换。从洋务派提出“中体西用”的文化纲领始，“体用之争”贯穿了整个 20 世纪。值得认识的是，伴随着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传统教育的命运发生了出人意外的逆转。毛泽东以不妥协的姿态激烈批判中国科举教育的遗留，发动了一场场主张与传统“彻底决裂”的“教育革命”和“文化革命”。然而，70 年代末，伴随对文革的否定和恢复中断了十年之久的高考制度，被长期压抑的全民族的教育热情迅速转化为考试主义、学历主义的强大动力，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对封建传统教育的批判和清理几乎销声匿迹，最终形成了一种以考试为中心、为考试而进行的教育——它被恰当地命名为“应试教育”。从大多数学校普遍存在的死记硬背、题海战术、师道尊严、分数至上、理论脱离实际等弊端，我们不难感受一百多年前科举教育的气氛和面貌。传统教育在当代的复活和强化，为我们认识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内涵丰富、不可多得的个案。

很多人意识到文化激进主义对现代中国的深刻影响，激烈的反传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现代教育几乎成为一场连续不断的否定。它在

满足社会除旧布新的急切愿望之时，也留下了对古老和晚近的传统未及清理甄别、一反了之的教训和遗憾。对科举教育的废止，中断了源远流长的书院制度和书院精神。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摧枯拉朽之势反对旧的教育、文学和文化传统，主张“打倒孔家店”，从而奠定现代思想文化的价值，具有某种历史合理性。建立在科举教育废墟上的新教育，在1949年之后变成需要革除的“旧教育”；在“不断革命”的加速之中，新民主主义的纲领也迅速陈旧。虽然1949年月12月，提出新中国的教育方针是“以老解放区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特别要借助于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但此后实际的教育发展，对民国“旧教育”的继承，仅限于延续至今的1922年建立的“6-3-3”基本学制。新中国的教育被十年文革清晰地一分为三。文革前的“十七年教育”在文革中也被宣布为“旧教育”，成为被推翻、打倒的对象。

与此同时，是中国文化传统和道德资源的迅速流失。中国的文化遗产，无论在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层面，保护和抢救都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学校教育的人文内涵也在严重流失，教育蜕为教学，教学蜕为训练，树人育人的过程日渐变成考试之学、技艺之学，青少年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不足、对民族文化的情感淡薄。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不得不扪心自问：当我们抱着破旧立新的愿望去改造传统，“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时，我们究竟摒弃和继承了什么？

作为后发展国家的共同经历，现代教育基本是引进、学习西方文化的产物。中国现代教育的建立，经历了20年代和80年代两次大规模的西学东渐，经历了模仿日本学制、学习美国经验和移植苏联模式这样的“拿来主义”，具有强烈的外来文化导向和外源性特征。这种学习和引进的特点之一，是由于近代中国险恶的生存环境、救亡图存的现实压力，致使从政府到社会对新教育具有急切的态度，如“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留学救国”的口号；赋予其强烈的国家功利主义价值。

这必然是一个中西文化强烈冲突、碰撞、融合的痛苦过程。新教

育从诞生之日起，一直有食洋不化、照抄照搬、非驴非马的批评，并出现了脱离中国实际的明显弊端。然而，同样不应忽视的，是一个世纪以来新教育在中国本土的发展中，所产生的内在动力和内在变化——现代教育的内源性生长。五四之后明确提出了建设民族新文化的任务，知识分子教育家在不同方向上进行的融会中西文化、将外来教育资源本土化、民族化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成为20世纪上半叶现代教育一个重要的建设层面。陶行知创建的“生活教育”理论，是将西方现代教育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成功典范。二三十年代蔚为壮观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黄炎培等在不同方向和理路上的实践，都是企图超越对西方经验的简单模仿，到农村和农民中去，探索中国有别于西方的独特的教育变革和社会进步之路。山西、广西等地成为普及教育的“模范省”的实践，则提示了在地方自治的格局下，因地制宜的发展模式和教育多样化的可能性。

5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进行的农民革命，努力将源自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本土化。根据地的革命教育实践成为现代教育在另一个理路上的内源性发展，它成为1949年之后新中国教育的主要资源。在六七十年代，毛泽东仍然在致力于走中国之路的探索。在教育领域，除了对封建传统教育的批判，他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对集中计划、科层化、正规化的“苏联模式”——它被称之为“无产阶级教条主义”——的抵制。毛泽东一再发动的“教育革命”，排斥和打击知识分子，以政治批判开路，寄希望于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发展教育，尽管有一些可以辨析的理论价值，其结果却是破坏性和悲剧性的。毛泽东的“五七公社”所宣示的那种否定社会分工、村社式和军营式的社会理想，则与社会现代化的方向背道而驰。

每一时期的教育都建立在“前朝教育”的基础之上，如何对待自身的教育遗产，便成为影响下一波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文革结束之后，理应对“十七年教育”、毛泽东的教育革命和教育思想等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总结，这一理性认识的深度和高度，决定着我们在新时期出发的坐标。由于历史的局限，这一任务并没有真正完成。我们在应当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应当发展教育上恢复了常识；但在什么

是好的教育、如何在新的起点上发展和改革教育等深层次的问题上，并未建立起新思维，而采取“回到五十年代”的简单态度。这是教育界与经济界和社会其它领域的最大区别，也是教育长期滞后于社会变革的内在原因之一。

20世纪教育现代化的历程，尤其是新中国的教育发展，启示我们认识中国教育的若干基本矛盾和基本问题。

在“教从政出”、“定于一尊”的传统政治文化压制下，政治与教育、学术的关系在20世纪的多数时期经常处于一种紧张状态。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争取学术独立、学术自由的努力，所标识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民国时期的“教育独立运动”以及蔡元培“超轶政治之教育”的改革等等，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思想文化遗产。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极左路线严重地戕害和扭曲了教育，政治凌驾于学术之上，政治教育取代了道德教化、人格养成和个性发展。“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到文革中沦为为帮派政治服务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导致教育被摧残、中断的悲剧。

社会现代化是一个日渐倚重和确立知识权威的过程。这意味着在教育、学术与政治之间，以及在国家、社会和学校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确立一种新的价值准则和权力结构。这并不是将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相阻隔，而是要求按照教育规律和学术规律，建立教育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性。教育不应是政治或者经济的简单附庸，不应是服务于短期政治、经济目标的实用工具。只有确认教育的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确立教育、学术为社会之公器的价值，才能真正确立教育的战略地位。实行大众教育还是精英教育，成为新中国教育发展的另一个基本矛盾。“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在理论上的区别，是认为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振兴而言，重要的是使少数人享受充分的教育、培养一批出类拔萃的英才；还是使大多数人接受必要的教育，培养具有良好素质的国民。在教育实践中体现为是优先发展高等教育，实行“尖子教育”、培养少数专家；还是优先普及基础教育，努力满足大多数人的基本教育需求。教育发展中这一“公平—效率”的两难选择，

在当时的话语中称为“普及”和“提高”的矛盾。它指向了两种不同的教育价值和方针：前者将重心置于城市和高等教育，通过重点学校制度，将基础教育纳入升学教育轨道，形成一个高度竞争的宝塔型的学校教育系统，重视正规化、制度化和智育；后者以普及基础教育和农村教育为重点，希望通过下放权力、因地制宜的多种形式办学、发展非正规教育等方式，扩大和普及教育。50年代初，围绕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和向苏联学习的正规化运动，源自解放区的大众教育路线逐渐转向了精英主义。但这两种不同的理念仍在纠缠，并与现实政治中浪漫和务实的不同风格相迭，形成跃进与渐近两种发展道路的冲突，集中体现在毛泽东发动的1958年的“教育革命”和文革中的教育革命，酿成新中国教育大起大落、动荡不已的面貌。

教育发展中的不同价值、理念、模式、路径背后，是不同的教育文化。一个世纪以来，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社会思潮经历了从儒家学说说到“中体西用”，经自由主义到国家主义、权威主义的变化，深刻地影响了教育的功能和学校教育的培养目标，导致教育价值在国家本位和个人本位之间、功利主义和人文主义之间，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之间的移动和倾斜；学校教育在社会中心、儿童中心、学科中心价值之间的转变。

文革结束之后，80年代的第二次西学东渐，教育界重新传播西方思想学术，虽然也重温了从夸美纽斯到杜威的西方经典，传入了赞可夫、布鲁姆等当代国外的教育文化，但在精神的深度和传播的广度上与五四时期的文化启蒙不可同日而语。教育民主、儿童中心、学术自由、教授治校之类现代教育的ABC久已失传，阙失的这课尚没有真正补上。在学校教育中真正畅行的，似乎偏于工具性、技术性的方面，如英语教学、标准化考试，信息技术、多媒体教学等等。它是与教育自身人文传统逐渐式微、工具理性日益扩张的过程相一致的。

90年代以来提出的“素质教育”理念、废除中小学的重点学校制度、重视人文教育和恢复大学的综合性、基础教育的“均衡化”方针等，显示了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对教育的实质性改变，失落已久的人的

价值——人的个性发展、兴趣、态度、情感等等——在教育中重新显现。个人不再是任由搬动的零件、工具，而成为市场上具有活力和创造性的主体；自我选择、自我设计、自我投资不再是个人主义的奇谈怪论，它顺理成章地指向了学生中心、人本主义的教育价值，指向对多元化、多样化教育的追求。一种新的教育哲学正在生长。

在以教育和知识立国的现代社会，教育与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直接和紧密。诚如美国思想家加尔布雷思所言：“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国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民是贫穷的，也没有任何一国愚昧无知的人民是不贫穷的。在民智开启的地方，经济发展自然水到渠成”；“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学识、开明和品格的高下。这才是利害攸关的力量所在。”〔1〕

规模巨大，功能复杂的现代教育，如果没有一个清晰的价值目标、高扬的教育理想，其现实的发展就有可能丧失意义和迷失方向，甚至沦为没有灵魂、见物不见人的“教育工厂”。在新的世纪之交，正像在建立新学之初、50年代初和70年代末重建教育时一样，我们仍然需要回答：什么是好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能够真正兴国？

现代教育的发展，必然意味着教育在数量、规模和培养能力上的扩大；意味着充裕的教育经费、完善的学校设施、先进的教育技术等；然而，教育的现代性，主要是由其“软件”规定和说明的。例如，一个用电脑、多媒体技术装备的设备精良的学校，如果实行的仍然是考试至上、分数至上、“见物不见人”的教育，则与现代无缘。现代教育的基本追求，可以概括地说，是造就一种民主的教育（面向大多数人的教育）、活的教育（生动活泼的教育）和以人为中心的教育（而非智育中心、学科中心、书本中心的教育）。它具体体现为教育的普及性、教育的民主性、教育的人文性、教育的实用性，以及教育的公

〔1〕〔美〕加尔布雷思：《好社会：人道的记事本》，译林出版社，1999年。

正性。

中华民族的复兴，归根结底是文化的复兴。在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如何在融入世界主流文明之时延续和保持中华民族的文化特性，其重要性和紧迫性并不次于维新变法或五四时期。在建设现代教育文化的过程中，民族化仍然是一个有价值的目标。它所需要的，是对自身传统的改造和转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融合，以及对当代社会文化的应对整合。这需要尊重自身的传统，理性地梳理我们的文化之根，并通过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使之成为教育现代化可以凭借的资源。值得认识的是，我们不仅有一个古老的、民族文化的大传统；还有一个晚近的传统——五四新文化的小传统。因而，面对未来的挑战，我们不仅需要追赶和前瞻，而且需要回顾，需要重温并接续这两个伟大的传统。20世纪末，两岸三地互动的新格局，华人教育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极大地拓宽了我们的视野，启示了中国现代教育、现代文化在民族化、本土化方面可能的发展空间。

积一个世纪的建设发展之功，进入21世纪的中国教育需要在普及和扩大教育的同时，进一步解放思想，清除不适应现代化需要的观念障碍和制度障碍，促进教育制度的开放和多元化，提升和改善教育的内在品质，恢复教育的人文性和民主性，保持教育的公正性，从而使各级学校成为社会和社区的文化中心，成为文化传承和创新的源泉，成为社会文明和道德的灯塔，在新的世纪重新弘扬一个文明古国的教育之光。

本书的基础，是1998年承担的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九五”课题《20世纪中国教育现代化及主要特征》。这是一个跨校合作研究的课题，也是一次令人愉快的合作经历。具体的分工是：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谷平，负责20世纪初建立新学的研究；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商丽浩，负责民国初年教育现代化的研究；北京理工大学高教所副研究员宋钺，负责民国时期三四十年代教育的研究；北京理工大学高教所研究员杨东平，负责新中国前三十年教育发展的研究；汕头大学高教所副教授马凤岐，负责80年代以来教育发展、改革的研究。在

各部分初稿和材料的基础上，我负责对全文统稿，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和改写。

在这一课题于2001年底通过鉴定之后，为它的出版又一直修改至今，越改越不满、越改越惶惑。现在回过头看，当初以这样一个题目，对20世纪中国的现代教育做这样宏观的研究，是有些狂妄和不自量力的，现在当不敢作如是想。这既是因为学力有限，难于驾驭和深入这样巨大恢弘、纷纭复杂的历史，而且，这种研究思路可能也是有问题的，极易陷入“宏大叙事”的人云亦云和大而无当之中，而“构造”历史的时代早已结束。因而，几年辛劳，对它的期盼却由大渐小，现在我更愿意将它定位为对现当代中国教育比较个人化的解读，以与同道和后学交流。为便于这种交流，又增加了较多章节，以及图文，使其更具历史的实感和质感。如果本书不仅能为教育学科的师生提供现代教育史的另一种文本，也能成为非教育学科的学生认知中国现当代史的通识教育读本，便是对这一研究和写作最好的回报了。

二〇〇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于北京万柳，全民抗击非典之际

目 录

引言：世纪回首：中国的教育现代化之梦/ 1

第一章 废旧立新：20 世纪初的教育变革/ 1

一、新教育的萌发/ 2

清末的洋务教育—早期留学教育—教会教育—启蒙和维新教育

二、中体西用：洋务派的文化纲领/ 6

冲突与挑战—张之洞的《劝学篇》—对“中体西用”的文化批评

三、新教育的建立：从“百日维新”到清末新政/ 10

新政：维新遗嘱的执行人—京师大学堂—“癸卯学制”：现代学制的基石—科举制的终结

四、新教育的推进/ 17

新教育的进展—湖北成为“示范省”—江浙的“社会化”模式

五、中日教育早期现代化比较/ 20

中日关系的“黄金十年”—“和魂洋才”与“中体西用”—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之别

第二章 现代教育的建立：20 年代的教育改革/ 27

一、民初教育发展的特征/ 27

“五育并举”和民国教育方针—新教育的发展—课程改革和